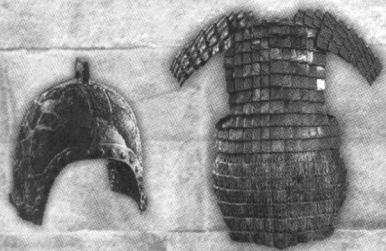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文化 安全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Security*

于炳贵 郝良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家文化 安全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Security*

于炳贵 郝良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于炳贵、郝良华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209-04168-3

I. 中... II. ①于... ②郝... III. 文化—国家安
全—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767 号

责任编辑:袁丽娟

装帧设计:周云龙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于炳贵 郝良华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168-3

定 价 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2)88194567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解读	(7)
一 文化的内涵	(7)
二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13)
三 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存亡与发展	(17)
四 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	(19)
第二章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不安全因素	(22)
一 全球化凸显了弱势民族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22)
二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不安全因素	(30)
第三章 “和而不同”——坚持正确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	(55)
一 坚持以“和而不同”为核心	(55)
二 正确处理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58)
三 坚持“综合创新”,反对不同形式的“文化中心论”	(61)
第四章 “与时俱进”——努力建设先进文化	(65)
一 先进文化取代落后的、腐朽的文化是历史的必然	(65)
二 先进文化的一般特征	(68)
三 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	(71)
四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构的方法论原则	(77)
第五章 “自强不息”——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83)
一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务	(83)
二 民族精神的科学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	(87)
三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方法论原则	(93)

第六章	“推陈出新”——全面推进文化创新	(96)
一	文化创新的内涵	(96)
二	文化创新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	(98)
三	文化创新的主要内容	(103)
第七章	“发愤图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115)
一	文化产业的含义及其在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115)
二	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121)
三	发展文化产业,从产业层面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 对策	(126)
第八章	“未雨绸缪”——建立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 和保护性屏障	(134)
一	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增强国家文化安全的 预防性	(134)
二	参与国际文化技术标准的开发和制定,强化文化技 术安全	(141)
三	加强国家文化安全法制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规范 网络运行,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法制和技术保障	(142)
四	加强文化安全机构队伍建设,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 组织和人才保障	(145)
第九章	“相辅相成”——坚持和完善国家的基本制度	(147)
一	国家基本制度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保证	(148)
二	坚持和完善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维护国家文 化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53)
三	坚持和完善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维护国家文 化安全提供强大的政治保证	(157)
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160)
第十章	“强基固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166)
一	教育是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	(166)
二	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促进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	(170)
三	迎接教育全球化的大趋势	(178)

第十一章 “得道多助”——积极推进国际联合反文化	
霸权事业的发展	(186)
一 世界文化多样性:人类文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186)
二 文化霸权: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元凶	(189)
三 世界文化版图重构:联合建立合理的国际文化 新秩序	(190)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196)
一 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萌芽	(196)
二 邓小平: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初步形成	(205)
三 江泽民、胡锦涛: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213)
参考文献	(223)
后 记	(231)

导 言

全球化浪潮的涌现,加速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步伐,同时也为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创造了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美国借助全球化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做法,极大地加剧和凸显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势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国家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都有着重要意义,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2003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强调,要“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国家文化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命题。国家文化安全既是一个国家安全命题,也是一个文化命题。就前者而言,文化安全是从整体的国家安全概念中解析出来的,是国家安全系统的子系统,并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它是凝聚和激励民众的基础,是维系国家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中。文化的繁荣、强盛与稳定发展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必将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形成无形的安全屏障并有效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就后者而

言,其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维护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其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破坏或颠覆。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一个国家的身份。文化是世代代积淀下来的,是我们溯本追源的地方。透过文化,我们知道自己的特性、传统和共同点。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它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确定其人类学身份的根本依据。因此,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一个具有高度民族凝聚力的国家,即使在政治、经济、科技乃至军事上比起其他国家来暂时处于劣势,也是不可战胜的;反之,一个国家尽管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缺乏民族凝聚力,国内各个民族、阶层或利益集团之间貌合神离、各行其是,也是不堪一击的。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在对于国家文化生存状态关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出来的。

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所必需的。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这本专著。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如何在开放的世界中,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广泛地、辩证地借鉴与吸取别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有效抵制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消极文化因素以及其他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文化的侵蚀与影响,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特性与民族精神,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维持文化的生态平衡,最终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全书共分十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解读”,主要从学理的层面探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并对国家文化安全做了科学界定。第二部分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主要探讨了全球化的内涵以及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殖民化倾向,凸显了弱势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并以全面的、辩证的观点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第三到第十一部分,从文化发展战略、建设先进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保护性屏障、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推动国际联合反文化霸权事业等方面,提出构建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一系列对策。第十二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本书借鉴了国内外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现代西方文化哲学中的有益成果,同时,也吸纳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和我国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新鲜经验,在许多方面力求突破和创新。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存亡相关性的视角,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做了科学界定。认为可以将国家文化安全归纳为: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范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明确提出国家文化安全,主要涉及制度、产业、精神心理三个层面。

第二,从学理层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指出全球化内涵着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虽然也意味着自然发生的文化的同质化和自觉推动的文化的高度互动化、相关化,但是它在目前已经更多地表现为显性的、强制推行的文化的殖民化;文化的殖民化或者说文化的帝国主义倾向消解弱势民族国家的文化特性,冲击它们的意识形态,弱化它们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从而极大地凸显了这些民族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第三,对影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因做了认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影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因做了较系统的探讨,明确指出对与反华势力之间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个别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弱化和不力;中国内部几种非主流文化的挑战;文化创新不强,文化产业弱小,在与外来文化竞争时处于相对的弱势等因素是造成思想文化领域缺乏对抗外来威胁“内应力”的根本原因。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外来威胁,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部因素而起作用的。

第四,明确提出文化创新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并对此做了学理的论证。我们认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兴衰根本上取决于文化自身能否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不断创新。并对文化创新做了科学界定,认为文化创新是包括文化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体制创新在内的一个有机体系,四个方面的创新形成了一套整体性的文化创新联动系统,共同构成文化创新全面提升的内驱平台。

第五,对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明确提出,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是要在对中国文化产业基本国情广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安全“红线”,尤其是它的早期报警系统。通过对国际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及其以各种渠道影响和进入我国文化市场所可能导致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特别是对可能引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灾难性后果的不良趋势的分析,能够及时而准确地做出预告性和警示性反应,启动相应的国家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以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和文

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进行鉴别。对符合中国国家文化利益和有助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表示认同,给予支持;对不符合甚至严重侵害中国国家文化利益,对民族文化产业构成严重威胁的,则予以坚决拒绝,并给予打击和抵制,从而把可能对中国文化生存与发展造成威胁,即对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危机的因素和力量,牢牢控制在安全警戒的红线之下。并且提出要对警源、警兆、警级和对策进行分类,建立起系统的指标体系。如对警源可以划分为影视、软件等类别;警兆可以从市场占有率、文化企业发展生存率等方面区分;而预警警级我们可以分为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对策系统我们可以采取注意、治理和应急三种方案。

第六,分析了国家制度与国家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提出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制度是在一定文化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给文化的发展以有力的支撑。有形的制度中渗透着无形的文化,无形的文化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得以表现。没有制度,文化就无法彰显,就无法树立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国家制度体现文化的价值追求,强化文化观念,保护文化观念,推动文化观念发展。所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不能不高度重视国家制度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真正调动全民族的利益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第七,全面分析了教育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作用,指出化民成俗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传承和创新文化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强调教育是传承文化命脉的桥梁,创新文化的基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所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第八,提出为更好地保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联合一切主持人类正义、爱好世界和平、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反文化霸权统一战线,推动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形成。

本书既有对问题的现实分析,又有对问题学理层面上的深度挖掘,体现了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维护国家文

化安全的对策性研究,既放眼世界全球化的大势,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各项对策比较全面系统,形成了一个配套完整的对策体系。

本书站在世界全球化的高度,对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做了学理上的深度挖掘,对诸如文化和文化安全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文化继承性与文化超越性、文化传统性与文化现代性、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文化认同与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的内因与外因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从文化安全的视角深化了对文化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同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不但提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运用这些方法论原则,具体分析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对策,对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第一章 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解读

研究文化安全问题,首先必须对文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做一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的解读与分析。

一 文化的内涵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动物没有。当我们浮光掠影般地仅凭直觉而缺乏理性辨析和逻辑推理去面对文化的时候,它似乎是极为简单的常识,简单得往往使人不屑一顾。然而如果我们拂开那种笼统的似是而非的直观层面,就即刻发现文化蕴藏着错综的复杂性。它的复杂性就在于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们经常使用且在民间得到广泛流行的这个词语是一个说明人类行为和人类历史的最广泛的概念,它所涉及的不是一种单项的事实,而是在普通事物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可计数的多种事项;它的复杂性还在于文化的内容是描述人类在扑朔迷离和纷繁斑驳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它显示了人类在数十万年间获得的关于他们自身,关于世界和人类共同享有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物的一切知识;它的复杂性更在于文化的运用极为广泛,而人们对它认识的视角又往往不同,这便导致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故而造成“文化”的歧义。正因为文化是这样一个复杂现象,所以要研究文化,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必须首先界定文化。又因为文化的复杂性,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被普遍广泛认同的文化界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万古不变的绝对科学的文化概念。人类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认识水平上来探索文化的,人类的认识既有局限又有所进化,因此,对文化的探索既有局限又有所进化。

应当强调,虽然很难有一个永恒的文化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界定文化。其实,对文化的每次界定,都是对人类认识文化本质的一次推动和深化。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对文化的探索从未间断过。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文化”的字样。“文”字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云:“五色成文而不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追根溯源,认为“文,错画也,象交文”。由此原始之义衍生,进而引申为事物的痕迹、事物的规律,有了文字、文籍、文章、文学之义。如《尚书·序》上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即指文字。进而“文”字有了与“质”、“实”相对的精神修养与美善德行之义。《尚书·大禹谟》称颂大禹的功德,曰:“文命敷于四海”,这里的“文”字,已有文德的意思,是说大禹以文德布陈于四海。《论语·雍也》中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野”指事物的“自然状态”,“文”指它的“人为状态”,从理论上自觉把“自然状态”和“人为状态”加以区分,这在中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许,此时已经表明人们开始意识到,“文”是由人“人为”努力而通过“规范化”所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在先秦思想家眼里,“文”成了各种美德的综合,《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语云:“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郑玄注《礼记》中曰“文尤美也,善也”。可见,“文”字自其始,便与今日之“文化”一词有着不解之缘。

“化”者,“教行”、“变化”也。“化”的本义为孕育、化生。“化”的本字写作“匕”,《说文》解释为“变也”(八上·匕部),就是变化。变化的先兆是孕育。所以《书·尧典》正义在解释“乳化曰孳”时指出:“胎孕曰化。”《吕氏春秋·过理》有一句话叫做“剖孕妇而观其化”,这个“化”指正在孕育的胎儿。可见“化”的意义特点是“孕育”。孕育的结果将是“化生”,所以《礼记·乐记》说:“和故百物皆化。”郑注:“化犹生也。”这个“化”指经由孕育而出生。《说文》:“媧,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十二下·女部)化万物,就是孕育、化生万物。《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曰,“赞天地之化育”,后又延伸出造化、大化等义,并由自然万物(造化)的生成、变易引申出伦理德行的化成,如《荀子·不苟》云:“化,迁善也”,“驯致于善谓之化”。《说文解字》云:“化,教行也。”又引《荀子·正名》之《注》说:“化者,改旧形之名。”因此,有“教行”之意的“文化”之“化”,本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自然的“人”通过“教化”而一改旧形,因自己的“行为”,变成一个与原来的自然状态有所不同的文明的“人”。

把“文”与“化”合用,最早见于《易·贲卦》的《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 在这里,天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治国家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把握现时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级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但此时,“文”与“化”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真正将“文”与“化”连用的是西汉时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刘向所说的“文化”,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整词。在这里,“文”与“化”仍各具独立意义:“文”指“文德”,与“武力”相对应;“化”指“教化”,即以文德来教化、感化,是对行为、动作的一种概括,颇有动词的意味。尽管如此,却也反映了“文化”一词的演变过程。在此之后,晋人束皙、南齐王融的诗文中曾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束皙在《补亡诗》中有“文化内缉,武功外悠”。^② 所谓“以文化缉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③ 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④ 元耶律楚材《太阳十六题》中也云:“垂衣端拱愧佳兵,文化优游致太

① 《周礼正义》第3卷,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37页。

② 《辞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57页。

③ 《昭明文选》第19卷。

④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页。

平。”^①显然,“文化”在这里已经是名词意义上的概念,其含义包括着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等。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非常广泛的“文化”概念,他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并说:“文之不可绝于天下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清儒彭申甫对“文化”也有类似的解释:“大而言之,则国家之礼乐制度;小而言之,则一身之车服,一家之宫室”。^②

总之,中国古代汉文字系统里关于“文化”的概念,一般有两种理解:其一是指历代统治者所施的文治教化的总和;其二是指文物典章、朝政纲纪、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日用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尤其在明清以后,中国传统汉文字里关于“文化”的理解已经与近代以来的“文化”概念有不少可沟通之处。但是,两者毕竟又有很大差异。作为“人类学”、“文化学”意义上使用的“文化”概念的出现,只是近代的事情。而我国古代的“文化”一词,虽有一定的含义,但缺乏明确的界说和规定。

西方语言中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文化在英语中写成 Culture,德文写成 Kultur,其源头都出自拉丁语 Cultura。Cultura 具有多种含义,如耕作、栽培、驯养、居住、加工等,其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对作为自然之物的土地进行耕耘、改良和开发,从而从上面获得自己的衣食需要的劳作过程。可见,“文化”一词在西方出现之初,是与农业上的耕作密不可分的。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认为:“‘文化’一词最初在欧洲语言中出现时,它还未获得今天我们所赋予的意蕴。在拉丁语和古英语中,它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实在意思。这种用法今天仍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ticulture)两词中保存着。”^③在“蚕丝业”(Silkculture)与“体育”(Physical Culture)等词中,也有这个意思。《牛津词典》把 1510 年作为文化的精神人文用法在英语中首次出现的日期。这里的文化已意味

① 《汉语大词典》第 6 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15 页。

② 《易经传义·解注辨正》。

③ [美] 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7 页。

着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而做出的努力。后来在这种物质性的栽培、种植的意义上逐步引申出神明拜祭、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含义。德语 Kultur 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英语 Culture 则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有关,二者又有差异。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一种精神和人文的指向,而拉丁语系的 Cultura 则是从对物质文化的解说开始的。

实际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是由近代欧洲人开创的。

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文化史和人类学进化论派的奠基人爱德华·B·泰勒(Sir Edward. taylor)先后给文化下过两个定义,1865年,他在《人类早期历史与文化发展之研究》中曾对文化界定过。而1871年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把文化作为科学概念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泰勒的定义虽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现代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但是它并没有统一人们的认识,很多人不满足于泰勒只从精神方面去界定文化。泰勒之后,人们仍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去认识、界定文化概念。文化的各种定义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美国文化学者 A·L·克罗伯和 C·克拉克洪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一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回顾》,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871年至1951年间的164个文化定义做了梳理和辨析,并据各自的侧重点将它们大致划分为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遗传性的和结构性的六大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概括:“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

① 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